

# 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徐俊西

## 理论卷



主编◎徐俊西

# 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



本卷主编 邱明正

## 理论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理论卷/徐俊西主编.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7-5617-2105-6

I . 上… II . 徐… III . 文学评论 - 上海 - 当代 - 文集  
IV . I 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578 号

## 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 理 论 卷

主 编 /徐俊西

本卷主编 /邱明正

组稿编辑 /王 焰

责任编辑 /陈贻恩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陶雪华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电话 62571961 传真 62860410

邮编 200062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厂

850×1168 32 开

19.25 印张 465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5617-2105-6 /I·205

定 价 /3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情感形式也都发生了深刻而急遽的变革。古人云，“文变染乎世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我国50年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也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今天当我们通过编写这套丛书来审视既往和瞻望未来时，便深切地感到时代的变迁和文艺的风云给我们文艺批评留下了许多值得认真记取和总结的经验教训。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虽然一度呈现过意气风发的兴盛景象，但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政治斗争和极左思潮已日趋激烈，特别是当最初几次在文艺界发起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展以后，文艺领域的创造空间和舆论环境变得更加狭窄严酷。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这部选集中所收录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论著仍然体现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研究者们对新的学术理论课题和文学创作研究的热情和取得的成果。

首先，在理论建设方面，以王元化、蒋孔阳、钱谷融等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家们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阐释新社会的文艺现象，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西方美学

和我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所以无论在美学、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都为我们坚守着一隅可供精神栖息的宝贵的审美空间和学术领地，这无论是在当时或现在，都是值得珍惜的。时至今日，这些非常坚实深厚和具有学术品格的理论仍然值得我们吸取和重视。

其次，在极左思潮日益泛滥，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日渐丧失的年代里，对于作家和评论家来说，他们的良知和责任感莫过于在坚持自己正确的理论观点的同时，敢于对违反人性和艺术创作规律的思想行为进行抗争。在那样的年代里，这既需要理论的勇气，又需要人格的力量。由此当我们现在重新读到巴金、王西彦、徐中玉等人直抒胸臆的真知灼见和刚正之言时，就不能不为之感动。例如巴老 1962 年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经一面用充满嘲讽和厌恶的口气表示，“我有些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和“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一面又满怀激情地呼吁，“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销声匿迹”。这是多么诚恳和率真的愿望啊。

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我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结束了极左路线肆虐的文化专制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政治热潮带动了文艺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步伐。而作为这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就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复归。在这方面，上海的文学家们自是热情高涨，积极投入，释放出多年来被压抑、被禁锢的创造激情和思想活力，老中青三代形成合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文学理论批评活跃繁荣的局面。

为了使多年来被各种政治教条和极左思潮作践得气息奄奄、面目全非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恢复生机，上海的理论批评界通过

“为文艺正名”(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口号的否定和修正)、“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讨论(对“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只能有一种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定义的质疑和争论)、“知性分析方法”的解析(对简单的、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方法的辨正)等重要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问题的批评争论,从政治上、理论上、方法上划清了现实主义传统和非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的界线,揭露了各种错误思潮和理论的危害,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复归”式的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现实主义的深化已成为当时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自觉要求。这种要求在具体理论形态上的表述,就是本质和现象、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情、认识和审美等从一元到多元的转换和多样性的统一,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审美反映更符合艺术规律和时代特征。在这方面,丛书中的许多文论,诸如《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蒋孔阳)、《论艺术美的延续性》(余秋雨)、《历史的追溯与现实的思考——漫谈新时期的当代文学评论》(潘旭澜)以及在“重写文学史”的名义下开展的对我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再认识和重新评论,都显示了上海文艺理论家在深化和发展现实主义批评方面的新的视野和理论成果。

作为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活跃繁荣的另一表征,就是在现实主义回归和深化的同时,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和流派一下都涌入我们的文坛。在短短的10年左右时间,正像当时的人们所说,我国新时期的文坛上几乎历演了19世纪中期以来欧美世界所有重要的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而大家知道,在这种新奇庞杂、异彩纷呈的文化浪潮中,上海文艺界也不惮前趋,一时涌现了许多评介传播这些新学科、新观念的理论译著和新潮人物,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组为现代派文学鸣锣开道和象征着我国文艺园地春色将临的几只文学评论的“风筝”,最早就是从上海的文艺刊

物《上海文学》上放飞出来的。在这期间，上海的文艺评论家们除了对现代主义的观念更新和方法热表现出极大的求新欲望和参与热情外，还较早地从盲目模仿和简单搬用转向了理性的思考和深入的辨析。其中如南帆等人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当时一哄而起的“方法热”作了犀利警策的剖析，认为名目繁多的新批评方法的涌入和运用“仅仅理解为表层的概念术语的大换班”，其结果就只能是“以新的名词装饰旧的结论”，使文学批评从一种简单化趋向另一种简单化。

进入 90 年代以后，文学理论批评一方面在 80 年代理论争鸣、流派纷呈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更加开放、更加直接的国际现代化文化交流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对传统的文化模式和审美规范形成新的挑战；同时也为适应新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形式的创造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和参照。另一方面，由于对现代化的精神转换缺乏准备，人们在商品经济的物质诱惑和外来思潮的负面影响下，往往陷入一种失落迷惘和虚无彷徨的精神状态。表现在文学批评和文艺创作上，就出现了现在人们经常非议的所谓消解深度、颠覆主题、现象还原、主体缺席等取消文学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非文学倾向，因而使这种转型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自己的精神品位和失去了往昔的社会荣耀。

然而尽管如此，90 年代的文学写作在它自我运作的系统中却仍然呈现出一种忙碌纷繁的景象，如其中既有 50 年来从未中断过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和 80 年代后期延续下来的“实验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又有 90 年代兴起的“新市民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和“晚生代小说”、“女性主义写作”等等。对于这些纷纭庞杂、多元并举的文学现象的及时审视和评论，无疑应当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一项重要而又烦难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既收集了李子云、王安忆、朱立元、李振声、邹平、陈惠芬等人对于 90 年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和流变透视评述的文论，又选编了郜元宝、胡河清、蔡翔、何

清、王宏图等人对王蒙、汪曾祺、王朔、张承志、陈染、林白等个案批评剖析的文章。与此同时，为了对新时期以来上海的作家作品作出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评析，我们在这套丛书中还组织上海的评论家专门编写了一卷《作家论卷》，以便在目前文学批评普遍比较浮泛冷落的情势下，作为对转型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一种热切的关注和思考。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人们往往把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思考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和未来的展望上。这一现象也明显地反映在这个时期上海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学科建设方面。如近年来关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之检讨与重建，关于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和趋势的评估与预测，关于对所谓后殖民、后现代、后新时期等“后学”的批评与争鸣……不言而喻，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今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1993 年由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曾在知识界和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家知道，市场经济发展中引发的迅速膨胀的物质欲望和利己主义如果不能得到与之相制衡的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的制约和感召，便有可能导致以牺牲社会公德和人类良知为代价的严重后果。而人文精神的讨论，正反映了文艺界、知识界中的有识之士对于这种现象的深切关怀和对人文精神的真诚呼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半个世纪以来上海的文艺理论界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和理论的前沿的。但是如果以跨世纪的历史发展的眼光对 50 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行深刻的反省，就不难发现在这个领域中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亟需重视的问题和亟待提高的认识：

其一，要努力加强适合我国美学传统和现代化文艺实践的美学理论体系和批评方法的研究建设。我们知道，一直作为我国文艺理论批评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学原理作为一种科

学的学科体系，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真正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由于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型，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也从所谓现实主义的回归、深化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各种新写实、新状态、晚生代、私人化写作、体制外写作等等纷至沓来……而我们的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却始终以不变应万变，凭借一些抽象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来“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其结果只能使得我们的理论批评脱离实际，失去活力，并逐渐丧失了与其他理论流派和批评话语交流对话的能力。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传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原因。继承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应当永远是开放的、实践的美学体系，而不是封闭的、教条的“规范美学”。正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发展过程的说明”，而拘守着过时的原理只能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要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传统，就必须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用人类最新的学术成果来丰富它、发展它，并真正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兼收并蓄，多元互补，而不是罢黜百家，定于一尊。与此同时，文艺理论界也要建立起自觉的理论兴趣和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学术品格，这样才能共同为建设和推动面向未来的新的文艺理论批评作出贡献。

其二，如前所述，人文精神的讨论是至今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有志之士发出的一种旨在疗救当前人们的精神失落和世风日下的真诚的呼吁。在这方面，我们今后除了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努力为建构一套与我国当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适应的人文科学体系以外，还要在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上把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和对现实人生的不断启蒙对应起来，从而把人文精神的理性思辨和诗化超越变为对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自我完善和对社会公众道德情操的具体规范。同样，人文精神在

致力于纯文学的审美批评时，也应该关心对社会大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心理的引导和塑造。因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目前常常被文艺专门家们看成是文化垃圾和艺术泡沫的通俗文艺仍然是亿万群众文化消费和娱乐需求的主要资源，而且在大众传媒和市场经济的炒作下形成恶性循环，即粗俗的艺术品迎合了粗俗的欣赏趣味和市场需求，而粗俗的欣赏趣味和市场需求又招徕了更加粗俗的文艺产品。这里似乎正好印证了老托尔斯泰的一个观点，即“在没有把商人送出殿堂之前，艺术的殿堂不是一座殿”。然而这毕竟是世界顶级文豪上个世纪坐在自己至高无上的艺术殿堂里所说的一句不着边际的诗化语言，对于我们今天这些整个儿都已陷落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知识阶层来说，除了依靠政府的文化政策和经济杠杆来加以必要的调节以外，恐怕也只能通过谦和耐心的审美引导和精神提升来实现自己的人文关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精神的重建就不能不重视文化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即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样才能把人文精神的讨论从建立当下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体系拓展为重塑未来世纪中国人的灵魂——用人文精神的圣火去点燃人民大众理想的火炬，实现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其三，关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突问题。当人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和计算机网络化的时代，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已经以一种全球化的形式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于未来世界的这种全新的文化态势，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态和对策呢？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对于某些精神部门是敌对的同时，就已看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时至今日，这种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和资

源共享必将进一步打破人们之间的思想隔阂和文化壁垒，促进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但是与此同时，在实现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首先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必须在全球整体化的背景下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归宿。这里我们既要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所谓“后殖民主义”，认为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才是实现人类文化繁荣的根本途径；又不赞成以东方为本位的新文化保守主义，企图建立什么东方化的“天人合一”的大一统体系。因为这些显然都是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法不协调的——越是平等的、自由的和全方位的现代文化传媒和交流方式，人类的文化发展就越是以无限丰富的多样化的形态呈现出来，而不可能再去重蹈已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覆辙。所以未来的国家和民族都应该以平等自由的心态参与到世界文化潮流的整体行列中来，相互吸取，相互整合，以达到全球性文化发展的自然融合。

当然，正像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一样，在实现人类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的矛盾冲突将不可避免，甚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和严重后果。其中如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必然会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甚至会阻碍破坏这些国家、民族传统文化自我革新的进程。而当这种文化冲突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形式走向极端，便会导致民族保护主义的排外政策和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的加剧，使得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欲速则不达。所以在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进入高度发展的现代化时期，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而现在仍在忙于制造文化“断裂”和垄断文艺话语权的行为恐怕是值得怀疑的。

另外，信息时代的信息爆炸和传播失控也会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知识结构带来新的困扰和问题。如果说工业现代化造成的环

境污染曾经给人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和威胁，那么随着信息现代化而来的“信息污染”是否也会给人类的身心健康造成新的危害和威胁呢？这里我们如果不能及早着眼于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精神素质的提高和知识更新的引导，恐怕是难以避免要受到这场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负面效应的影响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科学进步、社会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未来的世纪仍然是人们从初级文明走向更高级文明的过渡阶段。世界文化艺术的前途是光明的。

上海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主要发祥地和文艺理论家主要集散地之一。还在本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国外形形色色文艺思潮便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经过上海文艺家、理论家的辨析、吸纳、阐发，并在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相融通，同中国现实文艺实践相结合中，逐步建起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雏形。它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又凭借着上海特殊的文化地位，向全国各地辐射，生动体现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生成过程和发展态势，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但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上海这个开放的城市，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半封闭状态，苏联模式的文艺理论曾一度统领天下，尤其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文化批判运动，更使上海文艺理论园地笼罩在浓重的阴霾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被扭曲成死板的教条，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就像防止病毒一样被拒之门外，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理论被判定为“封资修”而遭到挞伐或被束之高阁，“左”的思潮严重窒息了上海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在 60 年代后半期和 70 年代前半期，由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权贵的兴风作浪，上海简直成了极左文艺思潮的发源地和大本营，上海文艺理论研究当然首当其冲，深受其害，而且也毒化了全国文艺理论阵地。

所幸的是，上海毕竟是中国新文艺产生的基地。“五四”新文化传统在这里发源，也在哪里生根。这里有大批有良心、良知的文艺家、理论家。他们在阴霾迷漫中仍按文艺自身的特性孜孜以求地探索着文学艺术的规律，勇敢地坚持理论研究的科学态度和批判精神，针锋相对地

批评了“文艺直接配合中心任务”论、“题材决定”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创作方法”论等当时流行的理论，平心静气地探讨着“文学是人学”、“美与艺术”等重要命题和文学艺术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叶以群、王元化、蒋孔阳、钱谷融等文艺理论家都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上海文艺理论园地也吹进了阵阵和煦的春风，文艺理论研究终于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为拨乱反正、清理阵地阶段。上海文艺理论家受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启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冲破重重理论禁区，对过去 20 余年尤其是在“文革”中被搅乱了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深沉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就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问题，文艺特征问题，共鸣和共同美问题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著，为上海文艺理论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第二阶段是 80 年代，为思潮迭起、剧烈争鸣阶段。一方面，这一阶段大量引进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文化理论，生发出许多新的观念和理论范畴，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苏联文艺理论模式，开拓了理论视野，同时也引发了开放与传统、继承与革新，吸收与创造以及文艺的本体性、主体性、方法论、风格论、艺术美和文学史观、比较文学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了再探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艺创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文学艺术流派层出不穷，创作中的实验、探索蔚然成风，大众文艺阅读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一切又引发了文艺创作方法、艺术流派、形象思维、艺术构思、典型性、真实性，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以及文艺内容

形式，批评标准、方法等问题的大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出现了多种学术流派，文艺理论学科也向纵深和综合这两个向度平行发展，促进了文艺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发展，逐步呈现出边缘性、现代性的特征。这一切便构成了这一时期上海文艺理论研究的多层面和全方位开展的新格局。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上海文艺理论研究最活跃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 90 年代，为文艺理论的多元并存、系统建构时期。上海文艺理论界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拨乱反正和多方面的学术争鸣，各派的基本思路已大致廓清。在“不搞争论”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80 年代形成的众多学派虽然大多延续下来，但两军对垒的阵式已逐渐趋于消解，形成了多元并存，各言其是的新态势。人们一方面着意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研究，努力将基础理论研究与探索理论前沿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制高点上重新审视和梳理了外来理论和中国的传统理论，致力于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出现了一批文艺理论、文艺美学、文学艺术史、文学批评史等方面的著作，并涌现出许多锐意创新的中青年文艺理论家，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上海文艺理论队伍；另一方面，面对着经济大潮对文学艺术事业的激励和冲击，面对着国际文化潮流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激荡，上海文艺理论家又怀着时代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深入探讨了西方文艺理论问题、比较文学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和文化生活中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诸如艺术生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大众阅读心态的嬗变问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关系问题，新市民文学问题，接受与创造的关系问题等等，逐步建构了文艺经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语言学、比较文学等文艺理论分支学科和新学科，开创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在 50 年的风风雨雨中，上海文艺理论研究既继承和发扬了优良传统，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特色。

上海文艺理论家十分注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确立其在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讨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1963年，上海出版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之一《文学的基本原理》。该书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精华，在文艺界和理论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八九十年代，上海文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发表了许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讨文艺创作规律、批评鉴赏规律、发展规律和形象思维、创作方法、典型性、真实性以及艺术美学等问题的论著，相继出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论文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学习邓小平文艺思想文集》和一系列文艺理论教材。在这种学习、研究和宣传中，既力求系统、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原著，正本清源，又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法，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当前文艺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新经验、新观念，对经典著作作出新的探讨和新的阐述，从而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贡献。

上海地处东海之滨，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海在近现代已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吸纳外来文化和文艺理论的最适宜的气候、土壤和巨大的潜力。还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便成为吸纳外来文艺理论的主要阵地，并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逐步实现中外文艺理论的融合。新时期以来，随着上海改革开放的深化，西方形形色色文艺理论、美学理论、文化理论更是如潮水般地涌上上海，上海文艺理论家对这些外来文艺理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诸如表现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符号论美学、现象学美学、分析美学、解释学美学、接受美学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进行了不断的梳理，先

后出版了《西方文论选》、《现代西方美学史》、《美学新论》和大量研究西方文艺理论、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论著，并力求把西方文艺理论同中国当代的文艺实践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相结合，逐步建构起同世界现代科学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结构系统。

上海文艺理论家既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更注重现实性、实践性研究，倾听现实的呼声，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思潮、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鉴赏的新趋势和新问题。上海文艺理论家既注重海纳百川，拒斥门户之见，又锐意创新，勇于探索，敢于涉足理论前沿，建构一家之言。他们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为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50年来，上海文艺理论研究几乎涉及文艺理论中所有重大问题，出版专著达数百种，散见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是中国文艺理论战线的重要一翼。本书作为上海50年文艺理论研究论文选集，当然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可能无遗珠之憾。这里所收论文计37篇，大致可分为七种类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的新收获；二是对文艺美学的新开拓；三是对文艺本质、特征和创作规律诸如文艺本性、形象思维、艺术构思、创作方法、典型性、真实性等问题的再探讨；四是对文艺内容形式的新见解；五是对文艺批评、鉴赏，文艺社会效应等问题的新思考；六是对文学艺术史观的新探索；七是对中外文学交流、比较文学的再认识等等。它们虽非上海文艺理论研究的“全豹”，但从这不太厚的卷帙中，却也可以大致窥见上海文艺理论研究50年来主要成绩和特色的“一斑”。为了能体现出50年来上海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进程和各年龄层次文艺理论家的贡献，本书按上述七种类型依次排列，而在每个类型中又大致按论文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并根据老中青文艺理论家的理论成就和论文所产生的影响确定其入选篇目。